千年回眸 古渠春秋

汉渠：承续光禄古渠 千年输水润沃塞上



汉渠进水口（秦汉分水闸）。（图片由自治区水利厅提供）

汉渠，又名汉伯渠，与汉代光禄渠有因承沿革关系。《旧唐书·李晟传》记载，元和十五年（820年）李听曾疏浚过汉光禄渠，溉田千余顷。《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二，宁夏镇条下记载，光禄渠在所（灵州守御千户所）东，志云："渠在灵州，本汉时导河溉田处也"。光禄渠与今汉渠位置相近。

明洪武时经过疏浚，灌田七百三十余顷。明天启年间，张九德创开芦洞（今清水沟涵洞），长35丈5尺、宽高各3尺5寸，自秦渠北岸抵窑桥，疏沟30余里，泄山水入河，解决了汉渠积水问题。万历十八年（1590年）监察御史周弘祢将河东秦、汉二坝，依河西汉、唐坝筑以石。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中路同知祖良贞浚深闸底，增长迎水堤，但因口底渠高易淤积，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中路同知祝兆鼎大修汉渠东岸，以消除山洪威胁。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灵州知州黎珠将汉渠原口让于秦渠，于野马墩另设引水口，外筑长堤，内去淤塞，下做八工闸（退水闸），而后又上延引水堤至杨柳泉。至嘉庆四年（1799年）汉渠有9条支渠，灌地12.58万余亩。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占奎、赵伦元于黑泉沟口，建减水闸一座，以便控水排沙。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灵州知州陈必淮重修。

解放前，汉渠自峡口渠口北流经金积县至灵武县胡家堡，尾水入涝河（即今清水沟），渠道全长50公里，有支渠289条，水闸12座，桥梁23座，灌溉农田13.36万亩。

1956年，结合巴浪湖农场引水工程建设，汉渠被整修廖桥以上段渠道3.89公里，裁湾3处。1957年，延伸张家小闸至杜家滩段渠道共计24公里。1958年，青铜峡水利枢纽开工，由导流明渠临时分水闸引水；1960年青铜峡枢纽截流后，从电站8号机组尾水渠引水。1963年10月，汉渠中段高闸被修建至张家小闸以下渠线，实施中段改道。1964年，新建高糜子湾泵站（后东干渠通水后废弃）。1969年，将原汉渠余家桥以上5公里扩整为河东总干渠，汉渠自余桥分水闸引水。1989年后，对汉渠高闸段4.6公里渠道进行标准化建设。1992年至1994年，先后翻建了汉渠灵南干沟、贡碑沟、斜桥、十里墩4座涵洞。1994年至1996年，汉渠26.5公里渠堤被进行加培，解决了汉渠安全超高不足的问题。1998年至2002年，全断面砌护了张桥至高闸段渠道12.3公里。

之后汉渠历经除险加固、灌区续建配套等项目实施，现干渠自河东总干渠余桥分水闸引水，向东南偏行，经峡口、高闸等折向东北，过巴浪湖穿山水沟，至杜家滩退水，渠道全长44.3公里，灌溉面积12.92万亩。

（本报记者 **单 瑞** 整理）

"协记号"见证 宁夏地下革命峥嵘岁月

中共宁夏地下组织"协记号"联络点遗址，位于中卫市中宁县城十字街口西北角。"协记号"联络点是中共宁夏党组织一个重要的秘密联络点。目前，"协记号"联络点原址被拆除。

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宁夏国民党特务机关加强了在宁夏范围内对共产党活动的侦察和防范。他们在各交通要道和黄河渡口设立关卡，盘查来往行人，穷尽一切手段搜捕共产党员，给中共宁夏地下组织开展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

在此期间，中央为发展壮大中共宁夏工委，就在当时中宁县城西街口的一间很不起眼的狭小店铺，设立一个秘密联络点——"协记号"，联络点的主要任务是护送地下党的过往人员，搜集敌情，传递文件等。该商号主要经营烟、酒、纸等小杂货。合股人先后有张重义、朱官义、刘顺则、张经堂等人，他们都是陕西省朝邑同乡人。"协记号"，寓意众人合力同心。

张重义、朱官义是中共地下党员。张重义是朝邑地下共产党的负责人之一，起义失败后遭敌人通缉，他和朱官义等人来到中宁，但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只能以做小生意维持生计，之后开设了"协记号"商号，不久朱官义等人先后离去。1938年，张重义回陕西找到党组织，恢复了组织关系，负责组建朝邑工委，担任工委书记，朝邑工委后改为朝邑县委，王博任书记，张重义任组织部部长。因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特别注意，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不得不再次离开家乡出走宁夏，回到中宁县"协记号"商号，并在上级组织安排下将"协记号"商号作为联络点来使用。

1939年10月，由于时任中共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已暴露，开展工作极其困难，中央决定派崔景岳、王博到宁夏接替李仰南的工作。11月，李仰南回延安汇报工作，建议换人员到宁夏工作，并在延安约见了崔景岳，把宁夏情况向崔景岳作了介绍，同时，约定在中宁县"协记号"联络点接头，再作具体交接。12月，崔景岳和王博从延安出发，经平凉、固原来到中宁县。李仰南则从定边出发，经盐池到达中宁县。12月下旬，他们在"协记号"联络点接头。接头后，王博被安排在宁朔县小坝小学白玉光处，崔景岳被安排在宁朔县宋澄堡小学马云泽处，以代课教师为掩护进行地下工作。安排妥当后，李仰南带崔景岳到各地交接工作，了解情况。之后，李仰南返回延安，崔景岳回到汉坝着手重建宁夏工委。

1940年3月初的一个夜晚，在汉坝小学召开会议，重建了中共宁夏工委，崔景岳任书记，白玉光任组织部部长，王博任宣传部部长。会后，崔景岳前往银川，白玉光前往小坝，王博前往董府（吴忠金积）开展革命活动。4月，宁夏地下党组织遭到敌特破坏，崔景岳、王博、白玉光等共产党员先后被捕。王博在狱中曾给张重义写信说："我已得重病住院，现请不到好大夫，请你为我打问。"暗示他已被捕，让张重义设法营救。不久，张重义从延安回来，营救王博未成。

由于江生玉叛变，国民党特务大肆搜捕在宁夏的中共党员，中共宁夏党组织遭到彻底破坏，中宁支部活动也很快就中断了，"协记号"联络点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1941年2月，根据上级组织安排，"协记号"联络点关闭，剩余人员都转移到延安，张重义被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

相关链接

张重义（1907—1947.3），1907年出生于陕西朝邑县（今大荔县）西高明村。在陕西大革命形成高潮时，张重义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并被推选为县农民协会的领导人之一。1927年7月，张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党的组织工作。1928年，张重义因领导学生罢课，遭到警察追捕，被迫出走宁夏，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才返回陕西。

回陕不久，张重义与中共沿河工委取得联系，接上组织关系。1938年4月，中共朝邑地方组织恢复，成立了中共朝邑县特别支部，张重义任特支书记。中共朝邑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后，任县工委书记兼组织委员。因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特别注意，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不得不再次离开家乡出走宁夏，在中宁县宁安堡一带从事革命活动。

1940年4月，中共宁夏工委遭破坏，张重义辗转到了延安，此后便留在西北局行政处生产科工作。

1946年，陕西省工委为了恢复和建立"国统区"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决定向关中和陕南派数百名干部，张重义也奉命带领武工队准备回朝邑开展工作。1947年3月，张重义等南下的干部行至富县双柳树村东南的山梁上，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张重义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40岁。

（据宁夏党史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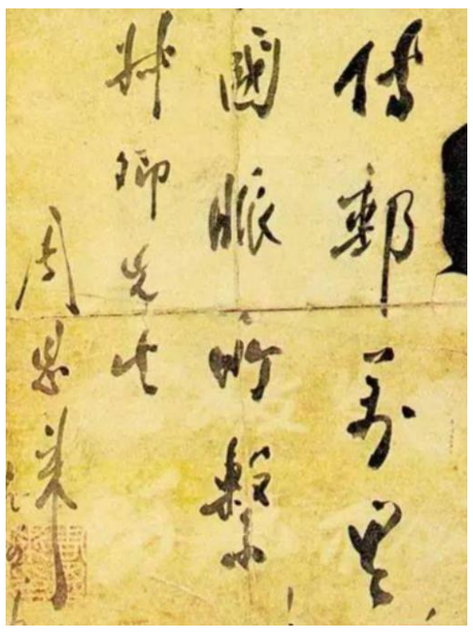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通讯站的运作机制（上）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通讯站建立了一套层级清晰、覆盖全面、制度规范的运作机制。这套机制以人力步行为基础，以免费服务为原则，以精简高效为导向，在极其困难的战争环境中保障了边区内部信息的顺畅传递。它既是战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来人民邮政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制度经验和人力资源。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通讯站是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环境下建立的一套战时邮政通信系统。该系统成立于1938年5月，抗日战争期间承担了边区内部党政军民各类信函、文件、书报刊物的收递任务，是延安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与国统区之间信息交互的核心枢纽。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整体考量，为与国民党政府所属的中华邮政区别，该机构未采用"邮政"二字，定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讯站。



◀陕甘宁边区邮票。



◀1940年5月，周恩来为邮政系统题写『传邮万里 国脉所系』。

组织架构与层级职能

通讯站的组织运作遵循分级管理、分段转运的原则。根据1938年8月边区政府民政厅颁布的《陕甘宁边区通讯站暂行章程》，通讯站共分为总站、分站、县站和联络站四级。这种组织设计既考虑了边区地域广阔、交通不便的实际状况，也兼顾了人力物力有限、运营经费紧张的客观约束。

总站设于延安，是整个通讯系统的最高管理中枢，设站长一名统管全站工作。总站的内部科室设置随实际需求多次调整：成立初期仅设置收发与总务两个科室，后续增设了计核科；1941年科室规模进一步扩充为邮务、人事、会计三科及秘书室、视察室，逐步向专业化邮政管理架构发展；1942年撤销秘书室与视察室，1943年边区开展精简整编后，总站又恢复为收发、总务两科的配置。站长一职先后由井宪章、张玉珍、刘笃义和刘义维4位同志担任。从机构调整过程可以看出，通讯站始终在业务扩张需求与精简节约原则之间寻求平衡。

在总站之下，分站是区域性的管理中心。通讯站成立初期设置了5个分站，分别位于延安、关中、三边、绥德和庆环。1940年总站迁址后，分站数量调整为4处。县站设于各县，最多时发展到24站，每站设站长一人，负责本县域内的邮件收转，统筹本县范围内的邮件接收与转运工作。联络站则设在必要的区乡和市镇要道，最多时达到16处。值得注意的是，联络站的代办员和通讯员均由不脱离生产的人员兼任，通讯站仅解决其食宿问题，不支付专职薪酬，体现了战时体制下充分利用地方人力资源的务实做法。

边区地方政府对通讯站工作负有监督职责。根据该暂行章程规定，各级政府应负责解决当地通讯站的实际困难，这一安排实际上建立了一种纵向协同机制：通讯站负责具体业务运营，地方政府提供后勤保障和行政支持。这种央地配合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通讯站自身资源的不足。

在人事配置方面，通讯员是通讯站最基础的人员。除总站拥有一辆自行车，绝大多数通讯员均依靠步行完成投递任务。每个通讯员每天需要行走70至90里路，在战火纷飞、物资匮乏的环境中承担着高强度的体力劳动。通讯站不追求人员的文化程度，而是强调吃苦耐劳和责任心。这种人员结构虽然原始，但在当时条件下保证了通讯系统的基本运转。（**未完待续**）

（**据《团结报》**）

